

多维度翻译伦理转向探微

徐 欣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随着人们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及对翻译实践的反思,翻译的伦理问题逐渐引起翻译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在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伦理思想,且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翻译实践彰显出不同属性的翻译伦理转向,并在不同层面上为翻译实践提供着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翻译伦理;存异伦理;因地制宜伦理;译者伦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3-0145-04

Multi-dimensional Tentat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Ethics Turn

XU X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eflection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translation ethic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translation theorists' concern.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ethical thoughts existed all the time and that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schools revealed different translation ethics turn in different attributes, which can provide effective theoretical instruction for translation practice from different levels.

Key words: translation ethics; ethnics of difference; ethics of location; translator's ethics

纵观人类翻译思想史可以发现,翻译界已经认可了“两个转向”、“三个阶段”的划分,其中“两个转向”则是20世纪人文社科领域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体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侧重于翻译的内部研究,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规律性及科学性,但这必然会引发对译者主体性的忽视,进而导致对翻译行为价值中立的错误判断,同时,语言学派认为翻译行为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与伦理并无关联。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致力于对翻译过程的外部制约因素的研究。这对于翻译行为背后所隐含的伦理问题有所揭示,但未曾认识到其严重性和研究的迫切性。从此便开始有部分学者逐渐从原有的学术阵营中分化出来,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就这样在翻

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萌发了。

一 “伦理”“翻译”与“翻译伦理”释义

若要展开对翻译伦理的深入研究,就必须首先要明确“伦理”“翻译”及“翻译伦理”这三个理论术语的内涵、指涉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才能据此确立翻译伦理研究的对象、范围及途径。伦理学在国内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未能以独立学科的形式出现,尽管我国古代对“伦理”二字的首次使用可追溯到西汉时期的《礼记·乐记》中“乐者,通伦理者也”的记载,但其中的“伦理”与我们当下所探讨的伦理学领域中的概念并不相等。直到近代日本人借用汉语中“伦理”二字来翻译西方著作中“ethics”一词之后,国内才开始广泛使用“伦理”来指代

收稿日期: 2013-03-11

作者简介: 徐 欣(1988-),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人际关系的规律与规范。^[1]

由于国内外在使用“伦理(ethics)”这一概念时常与“道德(moral)”混淆,而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阐释将“决定着各种伦理学理论的不同走向”,^[2]因此有不少理论学家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过深入的解析和严格的区分。例如,黑格尔认为,“moral”是指个人的道德和品行,是人的主观修养,“ethics”指的是客观伦理关系,演变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和内在操守;又如王明海所言,“道德仅仅是人际关系应该如何,伦理既包括人际关系应该如何,也包括人际关系事实如何”,即道德与伦理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和王明海等理论学家认为“道德所表达的主要是规范,而伦理所表达的不仅只有规范,还包括现象和规律,其指涉的范围远大于道德”。^[3]

伦理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但它始终是一个宽泛且模糊的概念,翻译的概念亦是如此。汉语中的“翻译”是涵盖了行为本身、行为主体和行为结果的一个综合体,也就是说,“翻译”既可指翻译活动这一行为,如“他在翻译一篇小说”;也可指从事翻译实践的主体,即译者,如“他是个翻译”;还可指翻译行为的结果,如“他的翻译很地道”。正是由于“翻译”这一概念的多义性,因而对“翻译伦理”概念的指涉予以明确界定就成为开启翻译伦理研究的首要环节。只有通过翻译的本质进行研究,通过对翻译与伦理的关系进行剖析,重新反思、审视“翻译”,才能把握好“翻译伦理”的研究范围和深刻内涵。

纵观中外翻译思想史,可以发现对于“忠实”“叛逆”“自由”等在翻译界始终引发争议的一些基本概念,其本身就是伦理概念,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翻译具有伦理性”这一理论判断,却早已从伦理角度思考翻译中的某些理论问题并指导翻译的实践。当翻译行为发生时,表面上看翻译是使不同的语言之间发生了关系,但语言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载体,是伦理思想及人的意志的载体,是因翻译行为的发生而产生碰撞的,因此,从本质上讲,翻译建立起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当译者在协调这种复杂关系时就必然要考虑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不同伦理关系,这就证明了翻译与伦理在本质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证明了从伦理角度研究翻译是翻译本身的内在需求,进而证明了翻译伦理的研究既包含了对翻译的规范性研究,

也包含对翻译规律或翻译现象的描述性研究。

二 翻译研究伦理转向的萌发:二元对立的超越

通过以上对“伦理”“翻译”和“翻译伦理”概念的解析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探究,可以看出,在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伦理思想。而在翻译界首次明确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术语的是法国著名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一书中。受当时社会环境及文化政治背景的影响,贝尔曼认为“西方的翻译大多表现出一种‘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使得译者在对待出发语文本时往往表现出太多的“自由”,以致最终翻译出的文本更像是自由的“再创造”,而不是真正的翻译。翻译的根本任务应在于产生“协同增效作用”;在于把译入语中语言和文化的“他者”当作“他者”来承受和接受;在于如何定义“忠实”;在于如何在理论层面上提出、肯定并捍卫翻译的纯粹目标——伦理目标。^[4]由此可以看出,贝尔曼反对“我族中心主义”,主张“尊重他异性”的翻译伦理思想,但同时也引发了与“贝尔曼主张的翻译伦理其实就是‘忠实’”类似的非议。如韦努蒂所言,“翻译的伦理不能局限在忠实的观念上……”,这显然是对贝尔曼以“忠实”为依托的翻译伦理思想的曲解。事实上,贝尔曼的“忠实”并非是“忠实与背叛”二元对立中的“忠实”,而是忠于“翻译的伦理目标”的忠实,是超越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传统二元对立观念的一种忠实。

贝尔曼的这种从翻译的伦理目标出发、尊重他异性的翻译伦理思想,充分体现出他作为翻译理论家站在人类文明、文化相融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审视翻译,这无疑将对翻译研究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翻译伦理研究的重要性。加拿大著名翻译家芭芭拉·戈达尔将始于贝尔曼直至今日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的翻译伦理研究称为“翻译的伦理转向”。

三 翻译研究伦理转向的深入:多维度伦理属性的彰显

在贝尔曼有关“将翻译伦理研究作为今后翻译研究的一个研究重点”的呼吁下,西方翻译理论界开始深化对“翻译伦理”概念的研究,以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并产生了大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有关

翻译伦理研究的成果和著作。

(一)彰显文化政治属性的翻译伦理

当翻译理论界从不同层面揭示出翻译的政治属性后,不少学者提出了相应的翻译伦理思想。如意大利裔美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从“存异”的翻译伦理到“因地制宜”的翻译伦理,无不体现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在跨文化交流中,只有反对文化霸权、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才是翻译的终极目标。

1. “存异”的翻译伦理

韦努蒂通过《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对17世纪以来的西方翻译史进行了考察,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审视翻译活动,发现了“翻译以其巨大的力量构建对异域文化的再现”;^[5]揭示出翻译可萌发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基于“我族中心主义”之上的仇恨。韦努蒂并没有满足于对翻译的这种文化政治属性的揭示,而由此转向了能使这一文化政治行为发挥积极作用的翻译伦理的研究。

因此,韦努蒂在《翻译的窘困:论存异的伦理》一书中,指出“翻译引发了许多严峻的、亟待解决的伦理问题。好的翻译就是实施非中心化,就是用译入语来表现异域文本中的异域性”,主张“以异化翻译在世界事务的现行状态里实施一种战略性文化干预”。^{[6]25}韦努蒂将这一翻译伦理命名为“存异的伦理”,是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的抵抗,显然这与贝尔曼的“尊重他异性”的翻译伦理思想异曲同工。而不同之处在于,韦努蒂将侧重点放在如何在翻译实践中更好地实现翻译伦理目标,如何将存异的伦理现实化。由于存异翻译伦理“改造了在本土文化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那些文化身份”,而且这一改造往往“随后发展为另外一种支配状态和另外一种种族中心主义”。^{[6]26}因此,韦努蒂开始有意识的进行自我解构,将翻译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语境中考虑,在对翻译实践所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的深入剖析后,韦努蒂在《翻译的窘困:论存异的伦理》的最后一章进一步提出了“因地制宜的伦理”。

2. “因地制宜”的翻译伦理

正如韦努蒂所言,翻译是在多重差异下运作的,不仅包括文化差异,还包括由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所造成的差异。因此,“当翻译使那些异域文化服从于本土文化中的异杂性的同时,翻译塑造

出了、事实上也已参与了霸权文化的本土身份”。^[7]也就是说,即使在翻译中竭力“求同”,追求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也很难摆脱与霸权文化之间所形成的事实上的共谋关系,归化的翻译最终依然可能起到“存异”的效果。因此,当“求同”与“存异”界限模糊时,我们只能继续朝翻译的伦理目标走去,以推动文化创新与变化为翻译的最终目标。这就是“因地制宜的伦理”,是由于相关两种文化在现有文化等级关系中的地位不同而采取的一种灵活的翻译伦理原则。可以理解为,只要是为了实现“推动文化创新与变化”这一翻译目的,“因地制宜的伦理”就既可表现为“求同的伦理”,也可表现为“存异的伦理”。然而这里的“同”与“异”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指“趋同”与“趋异”。那么只要翻译活动发生,“趋同”或“趋异”的成分都不可能是单独存在的。因此无论遵从哪种翻译伦理原则,其结果都是一种历史性的杂合,都应该是超越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也都是为了实现翻译的最终目标而产生的作品。

韦努蒂的“因地制宜伦理”,是将“存异伦理”置于更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具体阐释和深化,它们的提出均源于对整个世界范围内长期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的文化、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认识,是对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或“文化中心主义”的揭露和抵抗,因此,韦努蒂的翻译伦理思想更适用于从宏观上指导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

(二)彰显“女性主义”属性的翻译伦理

随着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兴起,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与女性所做的类比描述引起了女性主义学者的注意。谢莉·西蒙指出,在翻译思想史上早已出现了借用女性形象或气质来喻指翻译的低下地位的现象。例如约翰·弗洛里欧因认定译作天生有缺陷而将译作比作女性;梅纳日将“美丽”的翻译比作“美丽却不忠实”的情妇等。西蒙坚决反对这种随意使用带有性别歧视的词汇将译作视为“低弱的、派生的女性”,却将原作视为“强壮而有生产力的男性”。针对那些将翻译与女性均贬损于社会和文学底层的做法,西蒙呼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首要目标是识别和批判那些将女人和翻译都放逐于社会和文学底层的纷乱的概念”。^[8]随后,加拿大女性主义者又进一步将社会性别研究扩展到翻译理论的研

究领域中。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启发下,在对翻译被“女性化”过程的探究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者借鉴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成果,逐渐转向对翻译伦理的研究阶段,这是抵抗父权统治、抵抗翻译被“女性化”的最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由此可以看出,女性主义翻译活动从一开始便面临着严峻的伦理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早已显露出女性主义者追求男女平等的伦理目标。因此,确立女性主义的翻译伦理原则成为了女性主义译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为实现两性平等这一伦理目标,女性主义译者否定了传统的翻译观,开始逐步确立新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否定了带有性别歧视、原文崇拜的“传统忠实观”,逐渐建立起尊重女性差异,提倡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新忠实观”;并逐渐制定出明确的女性主义翻译方案,即:无论是在拟译本的选择、译者任务的确立还是在翻译策略的运用中,均以实现男女平等的伦理目标为依据,彰显女性主义伦理诉求。

(三)彰显功能主义属性的翻译伦理

20世纪90年代,随着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克里斯蒂安·诺德、安东尼·皮姆等学者从翻译研究的功能主义视角提出了独到的翻译伦理思想。皮姆认为,“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是为某一客户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一项专业性服务”。^[9]由此可以看出,皮姆的翻译观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翻译观,主张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对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和读者等因素给予更多的考虑,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皮姆的功能主义翻译观反映出并推动了他对译者责任的思考,使他开始潜心研究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而提出译者的“跨文化性”。也就是说,如果把翻译视为一项跨文化的交际行为,那么译者也是跨文化的,是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既需要对译入语文化负责,也需要对译出语文化负责。这种译者身份的跨文化性为摆脱二元对立的翻译伦理思想提供了可能性。

显然,皮姆提倡的翻译伦理是以一定的翻译目的为指导,综合考虑译者责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一种功能主义翻译伦理观。进而我们可以发现,皮姆是从译者的跨文化性出发,针对各种形式的翻译活动,来探讨能促进不同文化间合作交往的译者职业伦理。它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客户需要及译入语文化中的翻译规范,且遵照

译者伦理来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以确定翻译的策略,这种以功能主义为主要理论支撑的翻译伦理能够更好的指导非文学、非哲学文本及非宗教文本的翻译实践。

综上所述,自翻译研究发生伦理转向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界产生了大量的翻译伦理研究构想。本文结合翻译实践,对其中有代表性的翻译伦理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从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发现,任何翻译伦理思想的提出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对特定翻译活动所触发的具体伦理危机的回应;任何翻译伦理观的形成也都是以实现翻译的最终目标为依据的,即最大限度地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翻译伦理思想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适合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理论是根本不存在的,若要对其展开进一步研究,我们必须学会理性的借鉴而不是简单的拿来。因此,树立相对动态的、多元的、开放的翻译观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 [1] 王海明. 伦理学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98-99.
- [2] 何怀宏. 伦理学是什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1-15.
- [3] 高兆明. 伦理学理论与方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10-12.
- [4] Berman S, Wood M. *Nations, Languages, and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M].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5] 刘亚猛. 韦努蒂的“翻译伦理”及其自我解构[J]. 中国翻译, 2005(5):43-45.
- [6] Lawrence V.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7] 申迎丽, 仝亚辉. 翻译伦理问题的回归[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5(2):95-97.
- [8] 谢天振.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389-390.
- [9] Pym A. *Introduction: 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he Translator*, 2001(2).

责任编辑:李珂